

建制俗民誌及其對教育研究之啓示

陳玉玫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中文摘要

建制俗民誌是 Dorothy E. Smith 所創發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策略，本文首先探析其內涵與方法，其次省思其對教育研究之意義，獲得啓示如下：（1）要以個人經驗為起點，問題化學校日常生活世界；（2）研究採取的立足點，應增進對教育弱勢群體之關懷；（3）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應互為主體，並授權賦能研究參與者；（4）注重文本與論述分析，以發現教育潛藏意識型態；（5）擴充和轉移分析的焦點與範疇，著重教育現象微觀與巨觀脈絡之連結；（6）擺脫教育研究追求普遍化律則的迷思，方法應多元與融合；（7）深刻的批判並反思教育問題，強調研究即實踐。

關鍵詞：建制俗民誌、意識型態、社會關係、統治關係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Yu-Mei Chen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s a mea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at was developed by Dorothy E. Smith. It concerns the social relation behind the everyday life and has the research interest of critique and liberatory that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This paper adopted the way of theory analysis to analyz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content”, “related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 realize the meaning, method and distinguishing feature. Then the writer illustrated doing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ith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and discussed and reflected on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Start from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problematize the school everyday world. (2) We should concern the disadvantaged minority and take the standpoint of them. (3) The researcher and the objects of research should be inter subjectivity, and empower the research participators. (4) We should focus on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o discover the hidden educational ideology. (5) We should increase and transfer the focus and scope of analysis and emphasize the conne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icro and macro contexts. (6) We should get rid of the myth of seeking universal laws, and the method of research should be multiple and integrated. (7) We should criticize and reflect deeply on the educational issues, and emphasize research as praxi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deology, social relation, ruling relation

壹、前言

「建制俗民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E)」是加拿大社會學者 Dorothy E. Smith 所創發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源於她女性主義的意識省察，稱之為「女性主義的研究策略」。Smith (1987: 224) 在其經典的女性主義文本《問題化日常生活世界》一書中指出，要從婦女的經驗開始，讓其經驗發聲，並賦予她們權力以對抗壓迫。社會學研究過去均使用男性中心的觀點，排除女性聲音的存在，因此，必須重新探索社會，採取每日生活世界的經驗作為立足點，批判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中的論述 (Smith, 2002a: 18)。雖然 Smith 發展建制俗民誌最早是用來發展「為女性的社會學 (sociology for women)」，現在則被許多研究社群應用於社會科學、教育及政策研究等。事實上，Smith 的方法不僅是對婦女有益，亦有益於所有類似處於不對等關係中的人們，其動機即是要創立人民社會學來幫助人們理解受壓迫的情況，以研究對象為主體，並以其立場為出發點，進而達到改變其處境的目的。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的譯詞有建制俗民誌、組織俗民誌、機構俗民誌等，並無意義上的差異，本研究採「建制俗民誌」一詞。

因此，建制俗民誌者有批判或解放 (liberatory) 的目標，他們從事研究以便揭露產生次級 (subordination) 經驗之意識型態和社會過程 (DeVault & McCoy, 2006: 19)。其以認知社會不平等關係為前提、以弱勢者為研究起點、選擇以改變權力關係為目的之研究假設，與 Habermas 所提出的批判典範相符 (Neuman, 1994)。基於建制俗民誌的獨特性，此方法在歐美學術與實務工作等相關領域中被熱烈討論且廣泛地運用。2004 年 Smith 以 78 歲高齡應邀來台進行系列建制俗民誌相關的學術講座及研討，亦引起國內學術界的迴響，並引發筆者一窺堂奧之興趣。國外對於此批判取向俗民誌之探究與應用文獻已頗為豐碩，然在國內無論是學理或實徵的研究相對不足，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建制俗民誌 (Smith, 1990a, 1990b, 1999, 2002a, 2002b, 2005) 是一種發現日常經驗世界如何被關係擺放在一起的方法 (Smith, 2005: 1)，其與一般俗民誌研究均關注並致力於對社會現象之細微分析與描述，然相異處在於建制俗民誌並非將焦點專注於實徵性的經驗與文化探究，其聚焦於探索並描述各種不同的社會、編制性力量，一種形塑、限制、重組人們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實生活之力量 (Mykhalovskiy & McCoy, 2002)。可見，建制俗民誌著重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 之探討，並有明確的批判立場，有

別於一般傳統俗民誌。若要以建制俗民誌方式進行研究，則須先釐清其方法與特色，方能掌握其精神並達批判探究目的，否則研究結果將僅止於一般俗民誌之描述與詮釋。本文採理論及文獻分析方式，首先探析建制俗民誌之「意涵」、「相關理論」、「方法論」、等面向，以理解其內涵與方法。其次，舉例說明其研究之進行方式，最後討論並省思其對教育研究之意義，以期獲得相關啓示，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貳、建制俗民誌之意涵

建制俗民誌中的「建制」點出了此種探究方法之特色，然其所指為何？ Smith (1987:160) 曾說明如下：

我使用「建制」一詞以發現 (identify) 形成部分統治 (關係) 的複雜關係，此複雜關係圍繞著一個特殊的功能 (如教育、健康照護、法律等) 而被編制 (organize)。相對於官僚體制 (bureaucracy)，「建制」並非要辨識一種社會組織的確定形式，而是要看超過一個以上的 (統治) 關係形式之交叉和協調。

由上述闡述可見，建制意指為一種特定功能而建構的制度，例如教育、社會福利等。建制跨越不同場域，作用在不同社會關係中被人們使用，它也建構人與人間的互動，因此建制協調各個社會關係，協調我們進行的各種活動。可見，建制是一種穿梭並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在地情境的關係，並

不是科層理論當中的組織概念，亦非一種社會機構的形式，而是一種統治的多元關係的交錯與協調 (Smith, 2002a)。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環境，與別人在別處或他時進行的工作是息息相關的，我們也許對他們的工作不清楚、不瞭解，但他們做的事卻對我們很重要，甚至這些協調整合的組織制度會形塑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事，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都取決於它。此外，「建制可以想像成是在 (統治) 關係中的結，協調多樣的行動線 (strands of action) 進入一個功能的複合體中，而在協調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是有系統發展的意識型態」 (Smith, 1987: 160)。因此，建制是一種普遍化的論述，多元的經驗被簡化並置於特定的秩序中被理解，其亦為被標準化的工作流程，每個人扮演著特定角色參與其中，並視為理所當然。建制的概念，可呈現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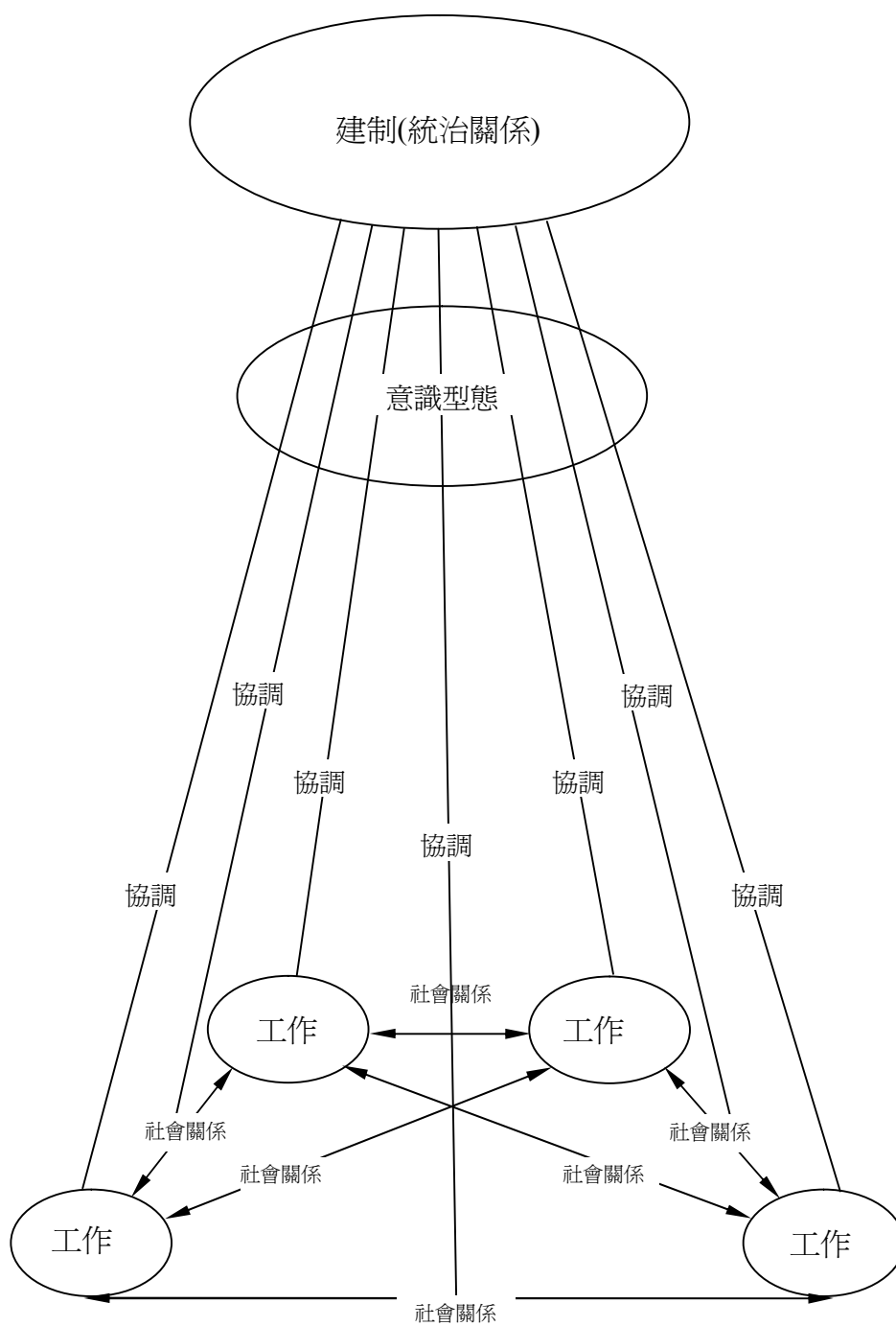


圖 1 建制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在釐清建制的概念後，建制俗民誌則可理解為一種探究的方法，其從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在地生活社會關係中尋找問題，並檢視文本協調行動、意識和跨地組織形式如何連串（Smith, 1987）。如 Devault 與 McCoy（2001: 751）所描述，建制俗民誌為「連接當地日常生活、組織和跨地行政過程之實徵研究」。建制俗民誌並不將研究的視角侷限於在地社會組織或人類生活經驗的描述，而是將每日生活世界視為問題化的開始，作為探究的來源，研究者的工作在於找出人類活動在社會關係及多元在地場域中的位置，以使人們進一步開始了解自己所未能覺察的生活及工作內容（Smith, 2002a）。總之，建制俗民誌探索的是形塑人們日常生活經驗之特殊且廣義的社會關係，其中的「建制」並非指特殊的組織形式，而是要提醒研究者，在研究中要將關注點導向發生在多元場地中被協調且交叉的工作過程，以發現其中隱而未現的統治關係。而此統治關係的形式如官僚體制、行政、管理、專業組織以及媒體等，它們也包括論述、科學、技術和文化等綜合體，其交錯、貫穿並協調多樣的統治場域（Smith, 1990b: 6）。

值得注意的是，統治關係中的權力，並非是強者對弱勢者的壓制，而是社會組織的、協調的，如 Limoges（2010）所指，論述是分享的與社會性的，因其源於社會群

體和文本的互動。文本可以是被閱讀的文字，可以是印刷出來的文字，亦可以是電腦軟體的文字，其可以透過各種形式來侵入、滲透在地情境（Smith, 2002a: 34），不同情境、時間的讀者，皆可能受到相同文本的規訓（Smith, 2002a: 35），而文本是在人們使用它的過程當中被啟動（activate）（Smith, 1999: 148-151）。易言之，透過文本的中介，人們的行動被規範化、效益化、責任化，那些文本所記載的如健康關懷、社會服務、教育傳遞等活動，均透過文本的論述及啟動，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活動（Campbell & Gregor, 2004: 34）。因此，文本必須有能實現它們作為行動指示的人，且之後將此推動於下一個閱讀和行動將持續這些文本媒介關係的某人、某地（Nichols & Griffith, 2009），而這樣透過文本傳遞的隱微不易察覺之統治關係，正是建制俗民誌所欲揭露的。

叁、建制俗民誌之相關理論

建制俗民誌是 Smith 對於社會學理論產生反思後的產物，除了自身的創見外，尚融合了其他理論。首先，其吸收了馬克思唯物論觀點，Smith（1990a）曾將知識比擬成商品，認為人們消費日用品，商品的價值藉由貨幣被普同化、透過市場經濟而複製，但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卻消失不被消費者看見；在統治關係中的「知識」有類似情形，人們消費事實，而事實價值的合法性，藉由

論述與文本被普同化、透過意識型態的循環被複製，然知識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者其背後意識卻亦消失而不可見。此外，建制俗民誌視社會為人們活動的協調，Smith 經由社會關係的概念擴展之。此社會關係如同馬克思所指涉之大規模人們活動的協調，其發生於多元場域內並跨越場域，包含彼此不認識以及未面對面認識之人們的活動。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社會中，「日常生活世界」（在唯物主義脈絡下每個具體化的主體）被跨地的社會關係以有力的方式所編制（DeVault & McCoy, 2006: 17）。

除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點外，建制俗民誌尚結合了女性主義對社會分工體制之省察、Garfinkel 的俗民方法論對社會習慣之質疑、加上 Schutz 對日常生活經驗之現象學分析、Foucault 對權力與論述之分析，以及 Cicourel、Zimmerman、Pollner 與 Zimmerman 等人對官僚體制中文件紀錄之分析等，可說是融綜各家而又獨具一格。簡言之，建制俗民誌是一種取向，其主要結合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者的方法和俗民方法論，加上來自女性主義意識覺醒實踐之洞見（DeVault & McCoy, 2006: 16），同時融合了現象學、論述及文件分析等方法。因此，建制俗民誌可謂將研究奠基於社會學理論，卻又拒絕擁抱任何理論，其同時連結了社會學的客觀性及建構性，並整合了鉅觀與微觀的社會學取向。

肆、建制俗民誌之方法論

方法論的內涵涉及對認知對象、目的與旨趣的假定、對真理的假定、對價值的假定、對於研究方法的假定等（黃鈺堤，2001：25-26），透過建制俗民誌方法論之探討，可理解其各種假定及方法之特色。本文依上述層面分述如下：

一、認知對象—理所當然的實在

以本體論之假設觀之，建制俗民誌認為世界之社會性是永恆的，個體依附社會，僅能以社會存在的方式立足於有組織性的社會生活，而社會即是一種人們活動的協調。建制俗民誌假定我們大部分活在 Schutz（1972: 74）所稱的「視為理所當然」的實在（reality）中，而此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常常似乎是太令人困惑、太強而有力、太神秘以致不能劃開表面以揭露深層，它無法讓我們容易而清楚地看出我們日常面對的社會所存在的根本問題。此外，我們的文化亦使我們陷入常識之中，並增加了分割的（segmented）世界，在那裡「實在」包括了各種的機制以確保社會的和諧，以及遵從互動的規範、組織的規則、制度的形式和意識型態等概念（Berger & Luckmann, 1967: 19-28）。如 Madison（2005）所指出，語言可以揭露，亦可隱藏，甚至最有利的文化象徵也可能擁有潛在的威脅，我們通常在接受既存選擇的限制中建立意義並選擇行動方向，但這些選擇常常反映隱藏的意義和未

辨識的結果。如果我們不斷地虛構捏造有關我們自己、有關我們是什麼、有關我們應該如何之強勢錯誤意識，那麼我們將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中（Marx, 1974: 37）。對批判思考者而言，本體論的假設可使其深入被接受的世界表象，呈現社會生活黑暗及受壓迫之隱晦面。

二、目的與旨趣－發現統治關係

基於前述對認知對象的假定，Smith（2005）指出，為能理解不同身份主體性被社會安置的差異性，解決人類被建制支配的困境，建制俗民誌從自我和他人的局部實際出發，以日常生活的人類經驗為素材，蒐集人類的工作知識，闡明各場域的社會關係，揭露日常生活中權力支配的統治關係，進而使得人們能抗拒宰制，促成社會進步。因此，建制俗民誌的目的並非要描述人們如何生活，或其分享的意義（Emerson, Fretz, & Shaw, 1995），而要發現這些「是如何發生的？」亦即，除了 what（人們的經驗為何）外，尚有 how（形塑這些經驗背後的社會關係為何）。社會學者的工作就是要發現這些未被意識到的關係，並將之繪製成地圖，讓人們能看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如何與他人的生活和工作掛鉤（hook）（Smith, 2002a）。人們在建制環境中可使用建制俗民誌去探究並重新設計自己工作的協調（Pence, 1996），但 Smith（2002a）指出，建制俗民誌的研究設計並不要求在人們能達

成的力量範圍外之激烈的整體改變。因此，雖然 Smith*批判傳統社會學對女性經驗的排除，拒絕被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但顛覆並非是其焦點。總之，建制俗民誌是一種研究實踐，其為想朝向更為公平社會發展的人們提供知識資源，以研究對象為主體，由其立場為出發點，幫助人們理解受壓迫的處境，進一步達到改變之目的。

三、無客觀真理－知識為社會建構

現代主義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或真理乃具有普遍性，可說明、操作與預測，故在地的、描述或敘事性的故事僅是一種充滿偏見的個人主觀經驗，無法算是真正的知識。然此所謂知識乃客觀真理之實證論者，受到詮釋學、批判理論者之質疑，他們認為知識乃是社會建構的。建制俗民誌即認為，知識的價值涉及歷史、政經及文化脈絡，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在理性的科學框架下，人的經驗被分解與客體化，而建制俗民誌並不遵循現代主義的知識觀，反之，相當重視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且建制俗民誌把每一個人視為自己生活中的專家。不過，由於被研究者的知識亦受到其所處之社會權力結構所影響，因此，建制俗民誌並非對個人主觀經驗賦予絕對的地位，而研究者要以反身性（reflexivity）去分析什麼樣的外在權

*Smith 以立方體的隱喻（各點相互連結）來說明建制俗民誌是如何分析和描畫各局部據點人類活動相互協調的關係地圖。

力關係運作在形塑研究對象的經驗。總之，建制俗民誌重視個人經驗，否定普遍真理之存在，並主張知識乃社會建構。

四、價值負載—無孔不入

建制俗民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強調的是反思的相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之建構，其並非強調客觀中立，亦不堅持主觀經驗必為真實。此外，建制俗民誌在進行研究前先找尋立足點，通常其以非統治者為對象，為其建構知識、為其發聲，企圖為社會中較為弱勢的族群找出未被察覺的統治關係。在此前提下，建制俗民誌有明確的批判立場，並認為知識是社會建構的，帶有價值涉入的意涵。亦即，建制俗民誌具批判的價值取向，研究所採的並非不涉入其中的觀察者角色與中立的立場，且認為社會研究的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認為研究是價值關聯且互為主體之知識建構過程，然探究中須時時進行批判與省思，以免落入過度主觀與偏見之中。

五、研究方法—批判取向俗民誌

俗民誌視人們為過生活與執行工作的專家，研究者要捕捉研究對象的在地觀點。建制俗民誌即是一種俗民誌的探索，但比一般的質性研究更加與政治、經濟脈絡連結，著重於分析社會生活中文本和論述的層面，卻又比多數論述分析更著重於文本運用的田野研究 (呂美慧, 2008)。建制俗民誌與其他形式的俗民誌一樣，倚賴訪談、

觀察和文件等作為資料，但有別於其他俗民誌的是，其並非將這些資料看作興趣的主題或對象，而是進入社會關係的入口 (entry) (Campbell, 2006)。事實上，批判研究方法論的基本特色在於其知識論 (Carspecken, 1996)，建制俗民誌屬批判典範，關注微觀的描述與理解，試圖了解其意義，以及意義背後的社會建構，並與巨觀的社會脈絡作連結，進而完成批判性的詮釋與解放目的。

伍、建制俗民誌之實施

由前述的分析可見，建制俗民誌有其方法論上之特色，以下就其實施方法進行歸納闡述，並舉 Griffith 與 Smith (2005) 以建制俗民誌所進行之教育研究精彩實例《Mothering for schooling》作為說明。在該研究中所要提出的問題是：「為何中產階級之家庭，亦即父親在外專職工作，而母親專職負責家庭工作與孩童照顧之形式，已成為美國公立教育系統中的典型家庭，而此是否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再製？」(Griffith & Smith, 2005: 2) Griffith 與 Smith 在此研究中，經由母親對於母職工作與參與補充性學校教育工作 (complementary educational work) 經驗的敘說，來分析其間社會關係的連結與其中所隱含的統治關係，以及組織政體當中存在的問題。其研究結果發現，母職投注時間的差異，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形構公立學校系統成為「不平

等的發動機 (engine of inequality)」（Griffith & Smith, 2005: 8-9），以下就建制俗民誌實施步驟進行說明。

一、發現一個方向—尋找立足點

建制俗民誌始於一些人們真實的議題、概念或問題，這些引導探究的方向（Smith, 2002a）。建制俗民誌來自於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與當代主流文化、意識型態之間的斷裂（Smith, 1987），此「斷裂」意指身體經驗與理性認知之間的落差，其通常是沒有權力者之共同經驗，其來自真實生活經驗在主流制度下的變形與擠壓（王增勇、郭婉盈，2008）。建制俗民誌研究的進行，首先是在建制規律（order）中尋找立足點（standpoint），以提供引導探究的觀點，而立足點的選定往往是權力關係中聲音被埋沒的弱勢者，以其生活經驗出發。譬如 Smith 即以其單親母職的經驗為起始點，和有相同經驗的人互相分享信賴、痛苦以及從和孩子的學校關係中所產生的罪惡感，想知道為什麼小孩會有所謂的問題小孩，因此開始了社會和學校組織以及母職和其關係的探究。

二、探究之內容—從經驗到組織

建制俗民誌並非是要去解釋人們的行為，亦非做理論假設的驗證，其探究的內容除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描述外，更重要的是此經驗與其所在組織的關係。在 Griffith 與 Smith（2005）的研究中，首先建

立一個以女人在制度脈絡下，其日常生活經驗的特別觀點，接著開始訪談有小孩在小學唸書的媽媽，透過此訪談可作為探討學校面的開端。研究有其階段性，先透過訪談以闡述女人的母職經驗與其孩子的學校之關係，接著研究的第二階段是將她們的經驗置於學校組織中來探討。因此，研究內容不只是母親的經驗，還包括她的經驗如何影響到學校中教師的工作內容。

三、訪談循序漸進—日常工作經驗對話

建制俗民誌以「工作（work）」作為一種隱喻，為檢視經驗的重要媒介，其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視為工作，如家庭主婦的母職行為。在社會制度環境中，訪談易流為泛論，這樣的論述是缺乏描述內容的，且對訪談者來說是無用的，而工作的概念，聚焦在具體且日常生活而非推斷的情境與觀點，其可避開那在客觀描述或意義概念間之主觀、客觀分離的問題。在 Griffith 與 Smith（2005）的研究中，受訪談的母親所描述的即是她們在家中對孩子所做的事，所謂的母職工作，包含孩子的日常生活與學習。建制俗民誌的訪談著重在描述性的日常生活經驗（Smith, 2002a），因此，其並不循著傳統社會學的程序，如以訓練的概念或理論來具體指定問題，反之，是一種日常生活工作經驗的對談。此外，你問不同人的問題，不見得會一樣，你可能會想要問同樣主題的問題，但是也可能你從前一次的訪

談中學到新東西，所以下一個人就可以問更進一步的問題，因此隨著時間，你會問越來越深入的問題。亦即，從已經知道的開始，然後一步步探索連結在一起的關係，因此問的問題不會預先都想好，他會隨時著研究的階段而改變，這就是建制俗民誌很典型的進行方式。

四、工作經驗之形構－探索意識型態

建制俗民誌者對受訪者進行訪談後，試圖拼湊經驗背後所涉及的工作流程，以瞭解經驗是如何被制度所建構，當瞭解工作流程後，研究者要進一步去解讀工作步驟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型態。Griffith 與 Smith (2005) 的研究即發現「母職論述」在不自覺中影響了母親、教師及學校教育，協調了母親與學校教育工作之間的關係。母職論述將母親置於一個奉獻的角色，在專家、書籍、知識的導引之下，母親成爲必須要爲孩童教育發展、人格、社交、整體安康產生負責態度的角色 (Smith, 2002a: 29)，這樣的論述形成一種意識型態，使母親對參與孩子的學校教育有義務感，若無盡到此責任會產生罪惡感，而無償地進行學校的補充教育工作。

五、社會關係分析－發掘統治關係

在建制俗民誌中，社會關係是分析的重點，分析工作是要找出受訪者的工作和他人工作的連結關係。此社會關係的概念引用馬克斯的論點，其並非單指人與人間

的關係，而是強調人們在社會中所付出的工作僅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而非屬於個人的成果 (Griffith & Smith, 2005: 124)。社會關係並非要指出現象類別，而是聚焦在人們於在地場域中所進行及經驗的如何和他人所活動的在地場域掛鉤在一起。Griffith 與 Smith (2005) 的研究以住宅區學校和商業區學校來區分母職任務的不同情況，可以看到母親如何處理及如何配合家裡每個人不同的作息時間，如何配合學校制度化的課程，也發現其中的差異性。在此，Griffith 與 Smith (2005) 的研究目的不是探討父母對個別孩子所做的教育工作，而是探討父母在家所做的補充教育工作對孩子學習成果的影響，並探究母職任務與老師及行政人員間的關係，此爲社會關係的分析。

此外，如前述及，建制是一種複雜的統治關係，是一種個人的、機構的、專業團體的多元活動，以及在活動過程中所產生並傳播的論述，這樣的過程與論述會集結成特殊的功能，例如：學校教育活動 (Smith, 1987)。由於建制俗民誌探究的是社會性編制中的統治關係，那些論述實踐的效應，因此思考的轉變點必須集中在建制是如何受到論述所影響，又如何進行運作 (Smith, 2002: 27-28)。在 Griffith 與 Smith (2005) 的研究中，不同地區母職的差異可視爲是中產階級婦女的母職任務專業化之後所產生的結果，而中產階級婦女無酬地在家中陪

伴與協助孩子，並無酬地參與學校教育工作的形態，產生了不平等（Griffith & Smith, 2005: 127），而此建制政體受到母職論述的影響，其協調著母親、學校人員之教育工作關係，但其中卻因中產階級婦女的投入學校補充性教育工作而造成孩子學習間的差異，引出階級所造成的教育不公，致使學校教育事實上隱含著不為察覺的統治關係。因此，一般認為公立學校有平等理想的可能性，但卻因中產階級女性之投入，反而成為製造社會不平等的發動機（Griffith & Smith, 2005: 133）。當然，若學校教育能有較多經費、資源投入，減少班級人數，讓教師有更多時間照顧每個孩子不同需求，提供更完善的教育服務，可降低因母職關係造成的學習落差，但學校教育又將教育問題推回給家庭，並與母職論述交織在一起，使學校教育中的不平等不斷複製下去。

六、建制俗民誌之方法綜述

由上觀之，建制俗民誌確有其獨特之處，而在進行建制俗民誌時真正要做的是什麼？Smith 指出三個焦點要項以界定建制俗民誌為一種研究策略，第一，要集中在意識型態，其次是廣義的工作（非僅是有薪金的職業），第三是聚焦於社會關係，要發現在地化的工作組織運作成為連結多樣人類活動場地之較廣社會關係的部分之方式（Smith, 1987: 166）。易言之，建制俗民誌任務主要包括：描述日常世界活動的協調、

發現意識型態觀點如何規定這些與建制規則有關的活動、檢視活動的在地場地被嵌進之更廣的社會關係（Grahame, 1998）。如 Smith（2002a）所指，建制俗民誌中，社會關係是分析的重點，主要由個人工作經驗中找到跨地的社會關係及權力所在之統治關係。

此外，由研究起始點觀之，建制俗民誌由自己生活經驗中的斷裂處發現問題，不過並非一定由己身經驗為開始，亦可以他人經驗為立足點以探究之。其次，由於建制俗民誌是設計來揭露日常實踐與統治關係間的關連，因此，建制俗民誌的研究對象比較是一般日常生活工作經驗者，如「有孩子就讀小學的媽媽」、「社工人員」等。又由於 Smith 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女性主體知識生產的認識論，開創了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新理論架構，因此建制俗民誌的探究對象常關注於女性經驗。如前述 Griffith 和 Smith（2005）對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關係之研究，以及國內學者楊幸真（2007）探究女性主義教師在大學工作的處境與女性主義之教學實踐。建制俗民誌開始於經驗，回歸到經驗，並使用經驗作為研究資料，以分析、說明人類世界的日常生活與真實（Campbell, 1998: 55）。建制俗民誌的研究發現並不意圖以理論加以闡釋或去驗證理論。

總之，建制俗民誌的研究和分析並非

要取代或重建隱含於社會制度中的經驗，而是要找出人們的經驗在社會制度中社會關係的位置，並闡述能創造出一種置放人們行爲和經驗的關係地圖。因此，建制俗民誌研究可以拓展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瞭解，就像是一塊區域的地圖一樣，幫助看到原來看不到的東西，可以看到組織裡頭的東西，是什麼在左右我們的實際生活。而當組織工作步驟如何複製詮釋特定意識型態被識破後，研究者將進一步詮釋工作步驟所使用的區隔如何強化或複製既有的外部社會權力關係，如性別、階級、種族等，從而完成對社會權力關係如何形塑日常生活經驗的批判性詮釋（王增勇、郭婉盈，2008）。

最後，須說明的是，建制俗民誌基礎假定認為，社會的事件（happening）存在於被協調的人們活動，而在地的實踐和經驗被連繫入延伸的社會關係或行動鏈（chain），而此社會關係或行動鏈是被知識的文本形式所媒介的。經由標準、複製的文本（如工作手冊、社福表格、法院文件等），能夠協調人類工作的在地情境。事實上，以文本爲中介的工作方式有益於統治性實踐，反映的通常是組織的利益，且是占統治地位的人之利益，因此，建制俗民誌鼓勵聚焦於編制工作流程的文本形式及知識的實踐。而 Griffith 與 Smith（2005）的研究例子，導向社會關係結果（sequence），即在於母職和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的工作間之交替點上

，在此文本並非直接牽連的最重要部份。亦即，其主要透過訪談對話方式，關注於日常生活經驗之社會關係，而非聚焦於文本的統治性分析。有些建制俗民誌的研究則著重於文本的重要性，以及在連續的人們工作編制上文本的處理過程（Pence, 1996）。當然，進行建制俗民誌探究時，會依研究狀況而有不同的著重點，如 Smith（2005）所指出，取向的選擇視研究者欲探究的情況，以及該處可得之協調人們活動的形式而定。

七、建制俗民誌在教育研究上之應用舉例

建制俗民誌在教育研究上有其適用性，因筆者本身在教育現場服務多年，深覺學校教育或整個教育體制有一些議題可以建制俗民誌方法來進行探究。如之前校園霸凌事件頻傳，其中不僅學生受到霸凌，甚至教師亦受到學生的霸凌，原本被認為應是最單純的校園，卻成學生暴力之源，受到各界的高度關注。以此爲研究議題，若研究焦點爲「受霸凌的教師」，將可以受霸凌教師爲立足點，由其實際經驗出發，探討校園中尊師重道的觀念爲何淪喪，而當教師面對學生的挑釁時爲何束手無策，更甚的是教師在受到學生言語或肢體罷凌後，爲何總是被息事寧人，無法爲自己討回公道。教師處在怎樣的社會關係中，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統治關係。在此即可檢視一些教育政策文本，如「零體罰」等，在教師沒有懲戒權的同時，在學生心目中是否造成教師

權威的下降。此外，教師在受到學生欺負後，仍須以寬大的胸懷原諒之，否則會被認為與學生計較而不具教師應有的風範，然而自己卻有苦難伸，此經驗的壓迫，正是建制俗民誌所欲進一步探究的。其中可發現到一些傳統教育或教師論述，如「好老師論述」等，形塑了教師應有的春風化雨、寬容與道德形象，且深植在每個人心中，因此，讓教師面對學生的無理，甚至傷害，僅能選擇沉默、寬恕而不得為自己發聲，加上或許受到社會權力人士之關說，使得教師敢怒不敢言。上述政策文本與相關教師論述，加上社會權力關係之介入，形構整個教育組織政體，此統治關係協調著教師、家長、學生及教育行政人員的工作，而當教師在實踐的同時，正亦不自覺地參與著此統治關係的運作。如 Nichols 與 Griffith (2009) 所指出，設計來管理公立學校教育的文本，只有當它們被人們在日常工作著手從事時才能達其目的，而教育政策的統治概念在進行一般學校教育工作的家長、教師和校長們之日常活動中被實現。

陸、省思與啓示

經由上述在「意涵」、「相關理論」、「方法論」及「研究實施」等層面之分析，筆者進一步省思建制俗民誌對教育研究之意義，綜合得到下列啓示。

一、由個人經驗出發，問題化日常生活世界相較於其他社會學理論對於經驗的主觀性

批判，建制俗民誌並不輕忽那些人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反之，個人的經驗變成是一種基礎，透過個人或群體經驗可以探索社會的關係，並進一步超越、連結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換言之，透過經驗可探索那些構成人們學校生活經驗的社會關係，或瞭解學校哪些論述或意識型態可能對學生或教師造成壓迫與宰制。諸多教育研究以理論為出發，試圖找尋符合理論的結果加以驗證之，常常未能著重個人日常細微經驗與主觀感受，而失去了瞭解教育問題之重要線索。且有時試圖建立理論，卻又未能由資料中紮根，因此，有些看似宏大的研究卻顯得空泛與片斷。透過問題化學校日常生活經驗，可以讓教育研究由最真實的教育現場中找尋研究方向，透過經驗的敘說，研究者得以揭露事件如何在人們的經驗中發生。因此，教育研究不應僅依附於既有社會理論所訂出的抽象概念，受限於理論框架，而應賦予活生生的經驗資料更多的關注，以提出創新的研究洞見來解析教育現象的本質與意義。

二、研究議題與立足點，關注弱勢群體與非主流文化

通常一個社會常有被大家遵從的主流意識型態與文化，而忽略了被邊緣化人們的經驗與聲音。對於批判性之研究，Thomas (1993)認為探究的熱情應起始於對不公現象、社會控制(語言、社會規範、文化規約)、

權力、科層體制、資源分配等議題之關懷，藉以呈現社會現象背後的文化意義及其對各種存有所產生的束縛。Leach (2000)指出，目前仍存於學校教育中的性別意識型態及各種性別偏見是達到性別平等理想之障礙，學校在不公平的性別關係得以永存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教育過程中潛藏之性別再製功能，值得吾人深入探討並揭露之。舉例言之，讓女子有機會進入學校就讀，並不代表就能夠確保她們在學校得到平等的參與教育的權利與獲得成就的機會。教育過程中教師對男女學生學習成就和生涯途徑之期望、教師回饋和規訓學生的方法、學校組織和管理的方法，以及各種潛在課程等，均可能蘊含著性別意識型態。因此，在教育研究中應多關注性別、種族等在教育過程中之不公平議題，以人道關懷與公平正義之精神，為受壓迫之群體尋求教育平等之權力。

三、研究過程互為主體，賦權增能研究參與者

以往教育研究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常處於不對等的地位，研究者往往以專家自居，且將研究對象視為一個無知的客體。事實上，主體與客體、認識者與被認識之事物，彼此均在不斷地相互適應中，應為一種辯證的過程。建制俗民誌將研究對象視為自己生活的專家，與研究者互為主體，其提升被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地位，擴大其研

究參與之權限，使之更具解放錯誤意識型態之能力。建制俗民誌提醒我們應關注研究中自我與他者的問題，並以「磋商」的方式與研究對象進行意義的建構與詮釋，整個研究過程應是不斷發展與建構的。一如 Rubin 和 Rubin (1995) 所指出，訪談者及受訪者是「對話的夥伴」。受訪者是一個地方、歷史及他們自己故事的主體，訪談者和受訪者要建立一種感覺舒適、信賴之相互關係(Mindful Rapport)，彼此為夥伴關係，一起對話建構記憶、意義及經驗 (Madison, 2005)。自七〇年代 Freire 在巴西進行成人掃盲教育運動開始，賦權增能概念即已進入教育論述的主流。教育研究若要達到解放的研究旨趣，那麼協助研究參與者建立自我價值及產生意識覺醒，是研究者所要努力的，而建制俗民誌亦強調其重要性。如 Hargreaves (1996) 所指，在後現代社會裡，教師不應只是知識的使用者，他們更可以是知識的生產者。故教育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關係，應是一種協同與參與合作的關係，彼此互為主體，使研究參與者在研究歷程中能獲得權能與意識提升，以共同致力於更為公平與合理之教育實踐。

四、文本與論述分析，發現教育潛藏之意識型態

文本在人們日常工作的實際中被讀及寫，協調著在地人們所做的與他人在他處或不同時間的工作，文本將外部的規定帶入每日每夜的生活世界 (Smith, 2002a)。

Smith 認為當人們活動於每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實際上便參與在論述當中（Campbell & Gregor, 2004: 41），如母親們的母職工作受母職論述的啓動，而研究即是要探究這些工作如何被啓動與編制。事實上，人們在參與活動的過程當中，會受到知識與事物運作邏輯的影響，同時也會貢獻出對於知識的詮釋，這樣的程序所代表的即是人們參與了統治關係的建構。因此，統治通常發生於人們查閱主流的、宰制的論述，並且根據對於論述的了解，產生行動（Campbell & Gregor, 2004: 41）。在教育現場，每一個人在學校日常生活世界中，亦會透過文本或論述進行實踐的協調。例如，關注於教育績效責任的政策或論述，改變了標準測驗和課程，協調了教室教育，而基於與績效責任之管理政策有關的課程方針，使家長和孩子的廚房餐桌上的工作亦導向於教室工作。學校與家庭教育常受各種政策文本、教育論述等之影響，人們的工作受其編制與協調，而其中是否涉及了意識型態與統治關係，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尤其公文文件，甚至家庭聯絡簿等大家習以為常的東西，應以更敏銳的視角去檢視之。總之，文本與論述是進行教育研究時不可忽視之分析要項，透過文本與論述之分析可瞭解教育相關之公文、文件、組織、制度等到底隱藏了多少意識型態，又其如何協調與編制著人們的各項教育活動。因此，教育研究應

深入探析透過人們敘說、言談、書寫等活動所產生的論述，及各種文件資料，以揭露教育活動中的各種權力與宰制關係。

五、微觀與巨觀視域交融，擴展並轉移分析焦點與範疇

以往量化的教育研究通常為鉅觀層面的研究，較無法顧及到實際課堂教學的微觀層面，而當質性研究者關注到師生互動的觀察與描述時，大多卻又未能顧及到社會層面的解說，窄化了研究視野，使得教育研究無法從較寬廣的社會脈絡來解釋教育現象的本質。建制俗民誌的特色為既能關注到日常生活經驗的細微描述與詮釋，又能超脫此微觀層面，與較廣的巨觀社會面向作連結，擴充了研究的焦點與視域。此提供了我們研究思考與分析的方向，即很多教育現象的解釋，不能僅侷限於研究場域之經驗資料，應將資料分析連結到更廣的社會關係來考量。亦即，嘗試連結意義的意義到社會權力和控制的較廣結構（Pfohl & Gordon, 1986）。總之，教育研究應著重微觀與巨觀之整體分析，由微觀的教室或學校生活經驗為起始，進而探尋形構此經驗之社會關係，以發掘教育機制所隱含之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讓教育研究能真正呈現出教育現象的全貌，並作為改善之依據。

六、方法多元與融合，擺脫追求普遍化律則之迷思

過去教育研究一向重視大規模資料的

調查與量化分析，而忽略了師生互動或教育活動實際情況質的分析。多數教育研究所關心的是一般規律或原理的探求，而不是某些特殊問題和現象，此類的迷思是由於量化典範追求因果關係的操弄與控制所產生的。然而，人類社會的繁複多變永遠無法如同自然科學般有齊一而規律的規則可循，且教育現象日趨複雜，傳統量化研究已難以闡述變動不拘的教育問題，需要詮釋與批判典範的質化研究之補充。建制俗民誌重視個體所處的社會關係與整個建制中之權力脈絡，所考慮的不僅是個人經驗本身，而是放在更高的層次，如複雜的統治關係的位置來分析。不僅可打破長久以來追求普遍化律則的迷思，並可尋求更適切的方向以解決潛藏之教育問題。總之，建制俗民誌所產生的關於人們日常生活如何受到統治關係協調與編制之知識，有益於進行意識型態的批判，因此，教育研究不僅要從客觀的量化資料中來發現事實，亦需以質的方法來理解，並批判這些事實背後的意義。而欲達此目的，教育研方法之多元與融合乃為重要途徑。

七、深刻的批判與反思，強調研究即實踐

建制俗民誌著重研究實踐，強調反省與批判，藉以喚醒社會意識，藉以改變社會現實，其雖然處理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卻不將之視為理所當然，這樣的批判思考用推翻視為理所當然的思考方式挑戰「真實」。此新的研究風貌，關注於社會關

係中潛藏的意識型態，企圖揭露主流的社會結構及其所蘊含的利益，亦加強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反思，藉以對所建構的意義網有更深層的理解。建制俗民誌對教育研究開啟了批判的視窗，提醒研究者不僅要去了解社會與權力關係是如何協調與編制的，同時也要協助人們去釐清自我所在位置之處境，培養其批判意識與自省能力。因此，教育研究者應以存疑的態度來看待似乎順理成章的事實，建構對於教育或學校日常生活世界的新知覺，使教育實踐免於各種意識型態的宰制，邁向教育公平合理發展之理想。總之，身為批判探究者須確保其研究工作不致淪為形式主義，要去質疑各種假定，以反身性去分析何種外在權力關係運作在形塑研究對象的經驗。且教育研究並非僅是理論與概念的建構，更須提供有用知識給教育實務工作者，使其有系統地思考之途徑，以理解教育行為背後的邏輯，進而批判反思教育過程中之不公平機制。因此，教育研究不應只侷限於靜態的探索，更應能付諸動態之體現與實踐，促進教育的反省與更張，以達到教育改善之理想目的。

柒、結語

建制俗民誌源於女性主義意識之覺醒，是一種對隱含的統治關係對人們束縛與不公之批判思考，本文就其「意涵」、「相關理論」、「方法論」、「研究實施」等四個層面進行探究。分析結果發現，建制俗民

誌是以個人日常工作經驗為起點，並分析形塑人們經驗的社會關係，強調文本為中介之活動協調。其欲描繪出人們生活經驗的社會關係位置，提供相關知識以求轉變社會不公的可能性，然抗拒與顛覆並非其焦點，比較屬於知識上的解放。在相關理論方面，建制俗民誌融合了馬克思主義、俗民方法論、女性主義等，然其雖奠基於社會學理論，但並不擁抱任何理論，而是 Smith 集各家學派加上自身創見的結果。在方法論方面，對社會實在的假定，認為個體無法自外於社會，所有現象須由社會整體來考量。其認為人類生活經驗受到建制的影響，因此企圖揭露限制人類行動的虛假、錯誤意識型態下之統治關係，帶領人們意識覺醒，以脫離不當的權力宰制關係。建制俗民誌不認為有所謂的客觀真理，認為知識乃是社會建構的。其有明確之批判價值取向，且認為社會研究乃價值關聯且互為主體之知識建構過程，探究過程須時時進行批判與省思，以避免過度主觀而落入另一意識型態之中。建制俗民誌屬批判俗民誌的一種，其使用觀察、訪談、文件與論述分析等一般質性方法蒐集資料。最後，在研究進行方面，建制俗民誌強調由個人經驗出發，由生活中的苦處與矛盾發現問題，其研究對象多為是一般日常工作，或是在組織政體下屬相對弱勢者，其中女性議題受到相當的關注。此外，在使用建制俗民誌研究策略

時，須掌握並聚焦於工作、意識型態與社會關係等要項，方能突顯其方法之特色。

由上述綜論可知，建制俗民誌通常由一般人們日常經驗的斷裂處找到問題，想瞭解此如何發生的，以及人們日常工作經驗之跨地社會關係為何，又這些關係如何被編制與協調；或者是想瞭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文件（如社福申請表格、學校公文等），蘊含著怎樣的權力關係運作，而其中之工作流程又服務了誰的利益？諸如此欲透過經驗來發現工作背後蘊藏的統治關係，提供知識資源，讓人們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進而達到意識覺醒，以尋求改變的可能性，此即為建制俗民誌所要做的。當然，若欲以建制俗民誌進行探究，除了瞭解其內涵與方法特色，並具備傳統俗民誌者基本的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外，尚須更多對事物的敏銳性與批判意識。對一般研究者來說，如何由大家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世界找到問題點，且從人們日常經驗微觀的細微描述到與巨觀的社會關係做連結，並發現統治關係，乃是一種挑戰。其次，立足點的選定，即以誰的經驗出發？是建制俗民誌者須審慎考量之處，因不同的立足點有不同的分析視角，其將有不同的批判詮釋與結果，站在某種立場進行批判的同時，常可能落入另一意識型態之中，研究者若無反思自己研究的能力或意願，則研究將淪為一種偏見。此外，教育研究是價值關聯

的，教育與所處時空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息息相關，其研究之應用與成效亦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批判之餘，要達到解放之目標，事實上還有一段距離要努力。然而，建制俗民誌對教育研究確實帶來了不少省思與啓示，也帶來了不同觀看生活世界之批判透鏡，為探究教育問題與過程開闢了另一種可行之方法途徑，不但有助於揭露教育實踐中所隱藏的意識型態與權力宰制關係，並可透過研究探尋改善教育現況的新契機，具教育研究之意義。最後，筆者深切體認，批判探究的動力源於對社會公平正義之追求，教育研究之使命應具有生命與熱情，亦是個人對教育的關懷與心靈之所驅。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增勇、郭婉盈（2008）。建制民族誌：勾勒在地權力地圖的社會探究。載於周平、蔡宏政（主編），*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頁 27-44）。嘉義：南華教社所。
- 呂美慧（2008）。M. Foucault 與 D. E. Smith 論述分析之比較及其對教育研究之啓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39（2），71-104。
- 黃鈺堤（2001）。*政治學方法論與行政分析立場*。臺北市：翰蘆。
- 楊幸真（2007）。女性主義教師與校園生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刊*，28，169-193。

二、外文部分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Anchor.
- Carspecken, P. F. (1996).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bell, M. (1998).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as data.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1), 55-73.
- Campbell, M. L. (2006).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as data. In D. E. Smith (E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pp. 91-107). Lat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ampbell, M., & Gregor, F. (2004). *Mapping*

- social relations: A primer i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New York : Alta Mira Press.
- DeVault, M., & McCoy, L. (2001)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ing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ruling relations. In J. Gubrium & J.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pp. 751-776). Thousand Oaks,CA: Sage Publications.
- DeVault, M. L., & McCoy, L. (2006).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ing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ruling relations. In D. E. Smith (E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pp. 15-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Emerson, R. M., Fretz, R. I., & Shaw, L. L.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hame, P. R. (1998) . *Ethnography,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blematic of the everyday world*. *Human Studies*, 21(4), 347 – 360.
- Griffith, A. I., & Smith, D. E. (2005) .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London and New York: Falmer.
- Hargreaves, A. (1996). Transforming knowledge: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8(2), 105 -122.
- Leach,F. (2000). Gender Implications of development agency policies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4), 333-347.
- Limoges, J. (2010) . An exploration of ruling relations and how they organize and regulate nursing education in the high-fidelity patient simulation laboratory . *Nursing Inquiry*, 17(1), 57 – 63.
- Madison, D. S. (2005). *Critical ethnography: Method, ethics and performance*. Thousand Oaks: Sage.
- Marx, K. (1974).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ykhalovskiy, E., & McCoy, L. (2002). Troubling ruling discourses of health: Us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ritical Public Health*, 12 (1), 17-37.
- Neuman, W. L. (1994).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Toronto: Allyn and Bacon.
- Nichols, N., & Griffith, A. I. (2009) . Talk, texts, and educational action: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of policy in practi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39(2), 241 – 255.
- Pence, E. (1996). *Safety for battered women in a textually-mediated legal syste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 Pfohl, S., & Gordon, A. (1986). Criminological displacements: A sociological deconstruction. *Social Problems*, 33, 94-113.
- Rubin, H. J., & Rubin, I. S. (1995).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dat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utz, A. (1972).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London: Heinemann.
- Smith, D. E.(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90a).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1990b).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 of ruling*. New York : Routledge.

Smith, D.E. (1999). *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2002a)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T. May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pp. 17-52). London: Sage.

Smith, D.E. (2002b).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T. May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issues in practice* (pp. 150 - 161). London: Sage.

Smith, D. E. (2005)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Lat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mith, D. E. (Ed.). (2006).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Thomas, J. (1993). *Doing critical ethn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